

1987年2月11日 星期三 第四版 南方日报



去年10月27日至30日，我往联邦德国的苏斯特市参加了第四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现代汉语教学讨论会暨“在德中文化交流中促进汉语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亲身感受到存在于一方异邦的一股汉语热。

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除联邦德国的55名汉语教师外，还有19名外国代表。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10人，来自台湾的3人。西德朋友告诉我们：这几年西德学习汉语的人数成倍地增长，汉语教师显得严重不足。有的大学学汉语的学生达100多人，却只有一名汉语教师，只好用“上大课”的方式进行授课。波鸿大学德国汉语教学中心的一位教师说，他们那里的学生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70岁。不少家庭妇女出很高的学费来汉语教学中心学习。

汉语热在西德可说是方兴未艾。我问一位德国朋友：“德国人学汉语，是为了来中国搞贸易吗？”他笑着说：“不，他们有的是抱着对古代中国文化仰慕的心情来学中文的，更多的是出自对现实中国的浓厚兴趣。”有位50多岁的中学女教师主动和我攀谈，表示很赞赏中国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她说：“中国真得大，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

西德的汉语教学发展得那样快，又是西德汉语教师本身的努力分不开的。早在1983年9月，西德30多位汉语教师便云集德累斯顿海姆市的美国大学应用语言学系，举行现代汉语教学讨论会。会议一致肯定：德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日益发展，汉语在国际交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决定把分散在各地从事或热心于汉语教学的力量组织起来，成

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语教学协会，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一期《春》。他们还派代表访问我国的大学，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与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签订合作交流协定。这几年，由于出现了汉语教师适应不了汉语热需求的形势，德国朋友要求我们在师资培训和高级进修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同时还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编辑出版一些适合在德国使用的汉语教材。显然，联邦德国这一长期间的中国热、汉语热，正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带给外国的一种新的产物。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Studentenschwemme

Die sinologischen Sprachseminare an den Hochschulen der Bundesrepublik erleben einen Studentenboom. Die Zahl der Chinesischlernenden hat sich seit dem Winter-Semester 1985/86 mehr als verdreifacht. Allein in Bonn haben sich für das Winter-Semester 200 Erstsemester eingeschrieben. Problem: Trotz der Vervielfachung der Studentenzahlen gibt es bundesweit praktisch keine neuen Dozentenstellen.

dnC Nr. 2/1987

联邦德国汉语教学面临“汉语热”持续增长新形势

1986年11月，我有幸参加了“第四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现代汉语教学讨论会”和“中外文化交流与促进汉语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应邀访问了几个城市，所到之处受到好客主人们的热情接待。联邦德国汉语教学的新形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德国是汉学研究时间较长、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之一。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联邦德国的汉语教学出现了新的势头。一些著名大学相继开设了现代汉语课程，一些公立机构或群众团体兴办的业余汉语班也应运而生。由此出现了一股遍及全国的“汉语热”。从我们访问所了解到的情况看，目前“汉语热”发展之迅猛，已使西德汉语教学界人士感到手足无措。联邦德国汉语教学协会主席柯彼德博士称学习汉语的人数是“爆炸性的增长”。据介绍，1985年学汉语的学生数目，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而1986年，比1985年又增加了一倍。用汉语的表达方式说，叫做“两年翻了两翻”。1986年光是各大学报名学汉语的人数，就达到两千。中学开汉语课的也大为增加。1984年全国开汉语课的中学只有四所，而1986年则增加到二十四、五所。业大、工厂企业或其他机构开办的汉语班，情况也是如此。

对教材编写原则的阐述与总结。也有从理论角度探讨语言教材的新趋势。在汉语教师培训方面，有培训班经验介绍，也有论述“跨文化沟通”在汉语训练中的重要性。具体教学方面，有利用图片、影视录相组织教学的经验总结，有新型字典的“使用与展望”，还有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教学和汉字处理的介绍与演示。

总之，这届年会无论从代表人数、代表方面来讲，还是从会议主题、学术意义方面来看，都反映出汉语教学与研究在新形势下的

据说，要求到波鸿汉语教学中心速成班学习汉语的，报名后要等一年才能轮上。柯彼德博士描述当前的状况时说，前几年是怕学生人数减少，千方百计想办法吸引学生；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付局面，想办法把学生教好。

学汉语的学生人数猛增，原因在哪里？据笔者初步观察、分析，原因似乎有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两国经济、贸易往来进一步增加，引起了有关人士对在本国扩大汉语教学问题的关注。(2)文化交流是贸易往来的基础；而实行两国文化交流，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是必不可少的。(3)不少人把学习汉语看成是对高级文化修养的追求。而许多青年人则对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抱着一种充满新奇的憧憬。比如，当问及一些青年学生为什么要学习汉语时，不少人这样回答：“中国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她是个东方大国，应该了解她”；“学习汉语会有到中国去了解中国古老文化的机会”；“听说汉语难学，学起来一定很有趣……”

联邦德国汉语教学协会组织的第三届汉语教学讨论会，是1984年11月举行的。参加那次会议的代表有五十多名，其中包括十几名学习汉语的学生。新变化。为了加强世界汉语教学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会议期间，各国代表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加强并扩大各国汉语教学组织、汉学研究组织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尽快建立统一的汉语教学国际性组织；在联邦德国创办中文的汉语教学业务性刊物，并筹划建立汉语师资培训中心；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学汉语的学生到中国去进修、实习；在教材、辞书编写方面，与中国实行双边合作，并寻求切实办法解决教材、辞书、教学资料的供应和交换问

1986年举行的第四届汉语讨论会，与上届相比，各方面都反映了进步与发展。首先，这届讨论会是和“中外文化交流与促进汉语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举行，而且会议得到了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的资助，得到了州政府、德中友协等团体更为热情的支持。其次，与会代表人数达七十多人，其中包括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二十名国外代表。有趣的是，中国海峡两岸的代表，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代表，在这次会上共聚一堂，互相切磋和研讨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也较前一届丰富得多。主题包括：教材与教学观念、教师的培训与进修、个别研究、各地汉语教学、汉学研究情况介绍与分析、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国际合作可能性等五个方面。发言的代表，大都准备了文章摘要或文章全文，当场分发。文章题目和内容，涉及面广，有些有相当的深度。在对汉语语言本身的研究方面，有对时态和语态的分析、比较，有“对标准华语发音之看法和探讨”，有研究“与时代并进的汉字”，有评介“海峡两岸汉语词汇的变化”，还有对虚词运用和修辞手段的研讨。在教材研究方面，有对自编新教材的介绍与展示，有对既有教材的评论与分析，有题。为了实现这一切，最关键的是经费来源。代表们提出，除向有关当局呼吁之外，还应该努力争取银行、企业或其他方面的财政资助，建立相应的基金会。

从联邦德国的一角，可以窥见世界汉语教学发展形势之一斑。眼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合作的前景却十分广阔。我们，作为汉语故乡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应该感到自己肩上越来越重的责任。

世界汉语教学， 预刊1/1987

任 远

# 世界“汉语热”和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

## ——访北京语言学院院长、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组委会主任吕必松

● 本报记者 萨光甫

在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即将召开的时候，为了对世界上兴起的“汉语热”和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作进一步的了解，我来到我国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高等学府——北京语言学院，访问了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北京语言学院院长吕必松。

吕必松早在60年代初就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科研，先后在尼泊尔、英国、美国任教、讲学并从事研究工作。

吕院长向我介绍了世界“汉语热”的由来和发展。他说，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深得人心，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业已取得很大的成绩，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和重视，在世界上形成了一股“中国热”。各国政府、经济界、教育界，各种友好团体，都希望了解中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到中国来旅游，进行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很多人都需要懂汉语，各种机构都需要汉语人才，“中国热”自然引起了“汉语热”。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学校开设了中文系或中文专业。日本学汉语的在校生达10万人，加上通过电视、广播等其他途径学习汉语的达100万人，仅大阪外国语大学就有500多名汉语专业的学生，而且录取汉语专业新生的入学分数线超过了英语专业。在日本、法国，汉语是

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外语，美国汉语教学的规模也不小，至少有180多所高等学校开设了中文专业，学生超过10000人，有些中学也开设汉语课。联邦德国学习汉语的人数，这两年是“爆炸式的增长”，今年的学生数比1985年翻了两番，中学开汉语课的也相当多；要求到波鸿汉语教学中心速成班学习汉语的，报名后要等一年才能轮上。位于南太平洋中心的一个岛国——西萨摩亚，面积有三千平方公里，人口十六万，生活在这热带丛林中的萨摩亚人，对新中国有着高山挡不住，大海隔不断的感情。1984年我国政府应萨摩亚大学（南太平洋大学分校）的邀请，派去了两名汉语教师，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华裔、当地萨摩亚人、长期在岛上居住的美国人、日本人、新西兰人，都纷纷报名学习汉语。萨摩亚大学校长全家六口人都是汉语班的学员，国家元首的女儿、孙子、孙女，副元首的子女都来上汉语课，课堂上还坐着几位国会的部长和议员。

吕必松说，世界各国汉语教学的发展，向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例如，向我国派遣更多的留学生，包括培养一些高学位的汉语人才；提供更多、更适用的教材和合作编写教材；提供理论指导和共同开展理论研究；向他们派遣更多的汉语教师和帮助他们培养自己的汉语教

师；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学术交流，等等。这些要求是合理的。作为汉语故乡的中国理应满足这些要求。为此就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唐代就是我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鼎盛时期之一，当时的首都长安有10000名外国留学生。我们正是在搜集当时开展汉语教学的有关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的文字资料和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汉语教学才真正成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1950年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62年成立了一所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专门学校——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这就是北京语言学院的前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有了更快的发展。1973年恢复招收外国留学生时，只有北京语言学院一所高等学校承担这一任务，当时只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学生。现在全国已有近80所高等学校和8所中国语言文化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和华侨、华人子女学习汉语。从1973年到现在，我国共接受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10000多人。从1978年到现在，共接受短期生约40000多人。

介绍到这里，吕必松说，“我国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引起了世界上的‘中国热’，‘中国热’又引起了

最后，吕必松院长告诉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和北京语言学院即将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会议期间，将在各国代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成立世界汉语教学组织。”

‘汉语热’，世界上的‘汉语热’，推动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在谈到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时，吕必松满怀喜悦地说，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今后的发展将更快。首先，国家对对外汉语教学更重视了，最近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由何东昌同志任组长。这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第二，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但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体系，而且在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第三，对外汉语教学不但有自己的专业杂志、学术团体，而且有专门的研究和出版机构。第四，这一点最重要，就是已经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包括一些著名的教授和副教授在内的、训练有素的七八百人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部分高等院校已办起了专门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专业——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都已招收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样，对外汉语教师的来源就可以得到保证，对外汉语教师的素质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吕必松说，这是发展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根本大计。

吕必松说，美国现有外国留学生34万人，苏联有13万人，罗马尼亚有8万人。我国是十亿人口的大国，汉语又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之一。到21世纪，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和作用肯定比现在要大得多，对外汉语教学必须与这一发展趋势相配合。我们应当加倍努力，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熟练地掌握汉语，直接用汉语了解中国、跟中国对话和进行各方面的交流。

最后，吕必松院长告诉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和北京语言学院即将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会议期间，将在各国代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成立世界汉语教学组织。”

# 发展世界汉语教学事业，增进中国同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京开幕

## 李鹏向会议发了贺信 何东昌到会讲话

本报讯 (记者萨光甫) 8月10日上午，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京开幕。出席这届会议的代表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共300余人。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国家教委

专职委员黄辛白、广播电视部副部长马庆熊、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宁及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朱德熙、陈原、张志公等出席了开幕式。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向会议发来贺信。贺信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工具，汉语为此发挥了自已应有的作用。目前，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海外侨胞和华人子女学习汉语蔚为风气。我们满怀欣喜地看到，随着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世界汉语教学目前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多年来，各国汉语教学专家学者，积极投身于汉语教学事业，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汉语讲坛上，为推广汉语，为增进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做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李鹏在贺信中向各国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在中国和世界

各国人民的交往中，汉语起着重要的作用。各位所从事的汉语教学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各位献身世界汉语教学事业的精神令人钦佩。”“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需要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各国同行的共同努力，需要经常的学术交流与友好合作，需要热心于世界汉语教学的人士的支持。正是基于这种一致的认识，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各国代表纷纷建议，由中国出面筹建世界汉语教学组织。经过两年的酝酿、协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组织将在这次会议上宣告诞生。我国政府将给予这个组织必要的支持。我相信，它同样会得到社会各界和各国之士的关心和帮助。”

本届会议是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和北京语言学院主办的。

中国教育报，1987年8月11日

#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开幕

## 300多位专家学者共商发展国际汉语教学大计

本报讯 记者汪远平、王大龙报道，世界汉语教学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于8月10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商讨发展国际汉语教学大计。

本届讨论会组委会主任、北京语言学院院长吕必松致开幕词。他说，在首届汉语教学讨论会之后的近两年里，世界汉语教学有了新的发展。各国的教学规模扩大了，专门致力于汉语教学的学术团体增多了，汉语教学的队伍更加壮大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也取得了不少进步。

在本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各国专家

学者将广泛进行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学术讨论。同时，在各国代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成立国际汉语教学学会。

本届会议已收到各国代表提交的论文200余篇，这些论文多方面、多角度地探讨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规律，反映出汉语教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水平。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发来贺信，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会议的各国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

又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北京语言学院10日晚举行招待会，招待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的全体代表。招待会上，新朋老友操着共同的语言——汉语，畅叙友谊和合作。

中国教育报，1987年8月4日

光明日报，1987年8月11日

# 用汉语建造友谊之桥

几无新, 年仅30岁的柯德, 被选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常务理事。

柯德是美籍华裔, 在美国加州大学应用语言学系讲授汉语, 1985年, 在首届国际汉语教学会议上, 记者曾访问过他。今年8月10日,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开幕式那天, 柯德在会上一见到记者, 就指着纯正的汉语普通话微笑着说: “上次谈了两个小时, 报上没有一个字儿都漏过, 我可不敢了。”

本报记者 王大龙

# 一位异国友人的希望

## ——访联邦德国汉语专家柯彼德

本报记者 菲 沪

在北京语言学院, 我见到了来京开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语教学会第一主席柯彼德博士。他研究汉语已有十六年, 发表过一些有关汉语教学的著作。他在发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汉语教学, 促进联邦德国和中国及其他国家在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方面,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86年, 联邦德国举行了一次重要的汉语教学研讨会, 他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

听说联邦德国掀起了“汉语热”, 热到什么程度呢? 我向柯彼德提出了这个问题。

“用你们的话说, 就是两年内翻了近两番!” 他诙谐地回答。怕你不信, 他报了几个数字: 1984年联邦德国学汉语的学生有一千五百人左右, 1986年底就达五千五百人以上。现在在全国不少中学都开设汉语班, 巴伐利亚州正准备把汉语作为中学必修课程之一。有二十多个大学设了汉语专业, 有两所大学设汉语专业。就在其中的一所——美因兹大学应用语言学学院担任汉语讲师。

“汉语和汉学有分别吗?” “汉语主要研究语言, 汉学则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等等。研究汉学首先要掌握汉语。” 他给我解释: “过去联邦德国有一些汉学家只能阅读古汉语, 却不会说。现在要求学生能用现代汉语会话。”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学汉语呢?” “那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关。现在两国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逐年增加, 联邦德国人民感到不懂汉语不行, 就纷纷学

习。许多学校还开办短期训练班, 有的大公司专门为技术人员办学习班。我就教过好几期短期学汉语的学生, 不教汉字, 只用拼音教口语。四个星期后, 学生就能掌握普通的生活用语。” 他兴奋地说: “短期班极受欢迎, 几乎所有到中国来的专家、技术人员、外交人员都去学习, 连大使都来学呢。现在到波鸿汉语教学中心速成班学习汉语, 报名后要等一年才能轮上!”

柯彼德给我看一本封面上印着汉字“您好”的书籍: “这是我们自己编的口语教材。” 我翻开一看, 从简单的“您好”、“您贵姓”, 一直到上飞机场、火车站、百货店的用语都包括了。这是速成教材, 要想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进大学汉语专业深造了。

柯彼德是1971年开始学汉语的。他回忆当时的情况: “那时一个班顶多十个同学, 到了高年级, 只有两三个人。困难很多, 没机会和中国人交谈, 教材和词典都不适用, 好不容易得到一盘录音带就如获至宝……” 但是他毕竟用自己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 取得博士学位。他说, 现在有了新的困难, 就是学生太多, 教师累极了!

原来学生增加了, 教师没增加, 平均一百个学生才有一位教师。美因兹大学现有二百五十多个学汉语的学生, 下学期估计会超过二百人, 但担任主课的教师只有两位。柯彼德每周要讲十六节课, 批改作业、编辑教材都要自己动手。

十多年来, 柯彼德教过的学生将近五百人, 他们分布在外贸、贸易公司、高等院校, 有的当翻译, 有的研究汉学, 为两国友好做了不少工作。

柯彼德对这次大会寄予很大的期望。他说: “中国是汉语的故乡,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中国专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学府——北京语言学院也在这里。以后我们联系、学习、提高都更方便。我希望中国随着经济开放的开放, 迎来一个文化交流的开放。”

他说出了大家共有的希望。

北京晚报, 1987年8月14日

光明日报, 1987年8月24日

# Gesellschaft für Chinesisch als Fremdsprache gegründet

In Beijing wurde die „Internationale Gesellschaft für Chinesischunterricht“ gegründet. Dies wurde am 14. August auf der Abschlussfeier des 2.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 für Unterricht in Chinesisch als Fremdsprache bekanntgegeben. An dem Symposium nahmen über 300 Experten aus 20 Ländern und Gebieten teil.

In seinem Grußtelegramm im Namen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wies Ministerpräsident Zhao Ziyang auf die aktuelle und zunehmende Bedeutung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hin, sie habe in der Vergangenheit dazu beigetrage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zu verbreiten, die Kontakte und die Freundschaft zwischen China und anderen Ländern zu fördern, und spiele heute in der Zeit der Öffnungspolitik eine wachsende Rolle in der Vermittlung von Kontakten zwischen China und anderen Ländern.

Lu Bisong, Rektor des Beijinger Spracheninstituts, erklärte: „Mit der Öffnungspolitik, der Wirtschaftsreform und den Aufbaufolgen Chinas wächst das Interesse im Ausland an China. Immer mehr Menschen wollen Chinesisch lernen.“ In über 60 Ländern und Gebieten wird heute Chinesisch gelehrt.

In Japan ist Chinesisch nach Englisch die wichtigste Fremdsprache, etwa 100 000 Japaner studieren Chinesisch an Hochschulen. Im Osaka-Institut für Fremdsprachen stellt die Fakultät für Sinologie höhere Anforderungen für die Zulassungsprüfung als die Fakultät für Anglis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war die Zahl der Sinologiestudierenden 1986 doppelt so hoch wie 1984. Die Zahl der Studienbewerber für Sinologie betrug allein 2000. In den USA gibt es etwa 10 000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der Sinologie.

Schon 1950 wurden in China die ersten ausländischen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für ein Studium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aufgenommen. Zwischen 1973 und 1986 studierten 10 000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aus mehr als 130 Ländern und Gebieten in China.

Chinesisch. Chinesischkurse wurden in den letzten 10 Jahren von 40 000 Ausländern besucht.

Früher bot das Beijinger Spracheninstitut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für ausländische Studenten, in China Chinesisch zu studieren, heute können sie zwischen über 80 Hochschulen auswählen. Etwa 800 erfahrene Lehrkräfte unterrichten Chinesisch als Fremdsprache.

Das Hauptbüro der neuen Gesellschaft befindet sich in Beijing. Der Vorstand besteht aus 36 Mitgliedern. Professor Zhu Dexi von der Beijinger Universität wurde zum Präsidenten der Gesellschaft gewählt. Die Vorstandsmitglieder kommen aus 15 Ländern.

Die Aufgaben der Gesellschaft bestehen in der Förderung des Chinesischunterrichts, des Kontakts und Austausches mit dem Ausland und der Forschungsarbeit. Die Gesellschaft beabsichtigt, eigene Publikationen herauszugeben und Informationen anzubieten.

Beijing Rundschau Nr. 36

8. September 1987

# 60多国千余所学校开设汉语课

##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本报北京8月10日讯 记者李德、卢继报道: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于今天在北京开幕。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日本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3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无需同声传译, 操着同一种语言欢聚一堂。

这次会议的任务, 一是进行学术交流, 二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成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向大会写了贺信。他赞扬各国汉语教

学专家学者多年来投身于汉语教学事业, 为推广汉语, 为促进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与会代表向大会提交了260多篇论文, 反映了国内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成果。学习汉语是6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新潮流。据不完全统计, 世界上已有60多个国家、1000多所各类学校开设了汉语课, 有的还创办了中文系。有些国家部分中小学已把汉语列入外语教学课程。旅居海外的侨胞都殷

人民日报, 1987年8月11日

从柯彼德1971年进波鸿大学汉语系学习现代汉语, 那时全班不过10个人, 当时他的想法是: “用汉语的教法, 成了历史课上的一次‘飞跃’。” 柯彼德探索这个大问题的事, 从1976年开始, 他读了许多中国的书籍, 其中有王力先生的著作, 到197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词汇学问题》。1981年, 他刚踏上中国的国土, 就要求见王力先生。见面时柯彼德激动地说: “王先生, 请您收下我这个外国学生。”

柯彼德1971年进波鸿大学汉语系学习现代汉语, 那时全班不过10个人, 当时他的想法是: “用汉语的教法, 成了历史课上的一次‘飞跃’。” 柯彼德探索这个大问题的事, 从1976年开始, 他读了许多中国的书籍, 其中有王力先生的著作, 到197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词汇学问题》。1981年, 他刚踏上中国的国土, 就要求见王力先生。见面时柯彼德激动地说: “王先生, 请您收下我这个外国学生。”

柯彼德1971年进波鸿大学汉语系学习现代汉语, 那时全班不过10个人, 当时他的想法是: “用汉语的教法, 成了历史课上的一次‘飞跃’。” 柯彼德探索这个大问题的事, 从1976年开始, 他读了许多中国的书籍, 其中有王力先生的著作, 到197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词汇学问题》。1981年, 他刚踏上中国的国土, 就要求见王力先生。见面时柯彼德激动地说: “王先生, 请您收下我这个外国学生。”

柯彼德1971年进波鸿大学汉语系学习现代汉语, 那时全班不过10个人, 当时他的想法是: “用汉语的教法, 成了历史课上的一次‘飞跃’。” 柯彼德探索这个大问题的事, 从1976年开始, 他读了许多中国的书籍, 其中有王力先生的著作, 到197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词汇学问题》。1981年, 他刚踏上中国的国土, 就要求见王力先生。见面时柯彼德激动地说: “王先生, 请您收下我这个外国学生。”

柯彼德1971年进波鸿大学汉语系学习现代汉语, 那时全班不过10个人, 当时他的想法是: “用汉语的教法, 成了历史课上的一次‘飞跃’。” 柯彼德探索这个大问题的事, 从1976年开始, 他读了许多中国的书籍, 其中有王力先生的著作, 到197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词汇学问题》。1981年, 他刚踏上中国的国土, 就要求见王力先生。见面时柯彼德激动地说: “王先生, 请您收下我这个外国学生。”



Noch etwas holprig aus Hamburger Kehlen: chinesisches Lied

Foto: Zhao Yongyou

## „Wir lieben Shanghai“

### Hamburger Schüler zu Gast bei einer Shanghaier Schule

*Von der Städtepartnerschaft zwischen Shanghai und Hamburg profitieren nicht nur Honoratioren und Betriebe, sondern auch Jugendliche. Zehn Schüler des Hamburger Waldorf-Gymnasiums und ein Lehrer kamen zu einem 14tägigen Besuch an eine Shanghaier Schule. Im Gegenzug reisten im vergangenen August zwölf chinesische Schüler und zwei Lehrer in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Während ihres Aufenthalts in Shanghai wurden die deutschen Gymnasiasten von der ersten Oberstufenklasse der örtlichen Fremdsprachenschule betreut. Deren 15 bis 16 Jahre alte Schüler lernen seit vier Jahren Deutsch. Hier ihr Bericht über den Besuch aus Hamburg, den sie auf Deutsch verfaßten.*

**S**IE waren neugierig auf alle Sachen in Shanghai, zum Beispiel auf den Mao-Anzug. Die deutschen Schüler interessierten

sich sehr für den Mao-Anzug, fast jeder hat einen oder zwei gekauft, außerdem noch die Mützen, die zum Mao-Anzug passen. Eine

genaue Erklärung dafür konnten sie nicht geben. Aber der wichtigste Grund war: Sie fanden den Mao-Anzug sehr chinesisch und natürlich. Außerdem kann man in Deutschland keinen solchen Anzug kaufen.

Sie waren auch sehr begeistert von Pandabären. Wir besichtigten einmal den Shanghaier Zoo. Die deutschen Schüler wollten nur Pandabären sehen. Endlich, als wir nur noch eine Viertelstunde Zeit hatten, fanden wir einen Pandabären. Aber was machte der gerade? Er schlief tief! Alle waren sehr enttäuscht. Aber wir hofften noch, daß er wieder aufwachen würde. Pierre Droste, ein 18jähriger Schüler, rief: „Bitte, meine

Liebe, wach bitte auf! Wir wollen dich nur mal fotografieren. Oh, ich bitte dich!“ Das Ergebnis war klar. Der Pandabär hörte nicht auf ihn.

Die deutschen Schüler lernten sehr fleißig Chinesisch. Wenn wir ein deutsches Wort sprachen, wollten sie immer wissen, wie man das auf Chinesisch sagt. Besonders tat das auch Wolfgang Haagen, ihr Lehrer. Er macht viele Karten, auf denen chinesische Wörter standen. Weil wir in den zwei Wochen jeden Tag zusammen blieben, lernten die deutschen Schüler auch ein paar chinesische Lieder von uns, etwa „Zwei Tiger“, „Kleines Kind“, „Liebeslied in Kangding“.

Immer, wenn wir zusammen in Bus saßen, sangen wir die Lieder sehr laut, so daß die Leute, die auf der Straße standen, es auch hören konnten. Herr Haagen ergriff die Gelegenheit beim Schopf und filmte. Wie alle Jugendlichen tanzten die deutschen Schüler auch sehr gern, wenn es ein Treffen gab.

Florian Roloff, ein 18jähriger Junge mit einer schwarzen Brille, ist sehr sympathisch. Als er in Shanghai ankam, bemerkte er, daß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Fahrräder ohne Licht sind. Er war darüber ganz erstaunt, weil man bestraft wird, wenn man in der Bundesrepublik kein Licht am Rad hat. Zwei Tage später kaufte er eine Menge Fahrradklingeln. Sein chinesischer Partner, dessen deutscher Name auch Florian ist,



Pierre und Sabrina zu Gast bei einer Chinesischen Familie: Zur Feier des Drachenbootfestes konnten sie zongzi kosten

wunderte sich sehr darüber. Er erklärte ihm, daß die chinesischen Klingeln viel besser als die deutschen seien.

Nach einer Woche besuchten die Hamburger Schüler die Familien ihrer Partner. Auch der deutsche Florian ging zu dem chinesischen Florian. Seine Mutter bereitete ein ausgezeichnetes Essen für ihn vor. Es gab Aal, Krabben, Pilze. Das Essen schmeckte ihm sehr. Zwar hatte die Familie extra Löffel, Gabel und Messer für Florian bereitgelegt, aber er wollte mal versuchen, mit Eßstäbchen zu essen. Weil es ihm noch schwer fiel, fiel das Essen manchmal auf den Tisch. Florian fing wieder an. Leider gelang es ihm immer noch nicht. Deshalb nahm er das Essen nun mit der Hand und steckte es sofort in den Mund. Na, das war viel einfacher.

Am 25. Mai wurde in der Shanghaier Fremdsprachenschule ein Empfang für chinesische und deutsche Schüler gegeben. Bürgermeister Jiang Zemin war auch gekommen und empfing die Austausch-Teilnehmer. Er sagte auf Deutsch: „Guten Tag! Herzlich Willkommen! Ich kann nicht gut Deutsch sprechen. Aber ich kann sehr gut Chinesisch sprechen. Bitte richtet dem Hamburger Bürgermeister meine Grüße aus.“ Herr Haagen hielt auch eine Rede. Dann gab es mehrere Programmpunkte. Die chinesischen Schüler tanzten einen deutschen Volkstanz vor, und die Hamburger Schüler sangen auf Chinesisch ein Lied. Zum Schluß sagten die deutschen Schülervertreter Pierre und Barbara auf Chinesisch: „Wir freuen uns darüber, daß wir Shanghai besuchen können. Wir lieben Shanghai!“

**Chinesisch für die Wirtschaft** will di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raunschweig jetzt anbieten. Speziell an Führungskräfte der Wirtschaft wendet sich ein viertägiger Intensivkurs Ende Januar nächsten Jahres. Die im Kurs verwendete Schrift ist die amtliche Umschrift der chinesischen Zeichen in das lateinische Alphabet. Vorkenntnisse sind nach Angaben der Hochschule nicht erforderlich.

FAZ. 19.12.87

## Auch Japanisch bringt Punkte

Immer mehr exotische Wahlfächer an bayerischen Gymnasien / Von Roswin Finkenzeller

MÜNCHEN, im Dezember

An sieben, demnächst an acht bayerischen Gymnasien wird in der Oberstufe Japanisch unterrichtet. Ein kleines Angebot, gemessen an der Fläche des Freistaats, ein großes jedoch, verglichen mit dem entsprechenden Angebot anderer Bundesländer und dem exotischen Charakter des Wahlfachs. Es braucht nur ein Lehrer sich bereit zu erklären und eine ausreichende Zahl von Schülern - zu Beginn zwölf, später acht - sich einzufinden, und schon kann der Unterricht beginnen, denn das Kultusministerium in München ist stolz auf solche Aktivitäten und beieuert, den Gymnasien in dieser Hinsicht nichts in den Weg legen zu wollen. Die Punkte, die ein Abiturient erzielt, werden ihm angerechnet, wenn es um seine Hochschulreife geht.

Japanisch ist schwierig. Wer sich auf diese Sprache einläßt, erkennt bald zu seiner Verblüffung, wie leicht Latein ist. Es sind ja nicht nur die Schriftzeichen, die dem an Buchstaben gewöhnten Europäer Rätsel aufgeben. In einem Jahresbericht des Aachfenerburger Kronberg-Gymnasiums, wo seit 1971 Japanisch gelehrt wird, ist von der „japanischen Logik“ als einer besonders harten Nuß die Rede. Es heißt weiter, den Schülern falle es schwer, wirklich nur das zu sagen, was „bein-

situationsbezogenen Sprechakt“ gesagt werden dürfe - die Betonung liegt auf „dürfen“ - weil der Japaner auch in der einfachen Unterhaltung Höflichkeit, Disziplin und Konzentration schätze.

Der Japanischlehrer eines Schwabinger Gymnasiums bekennet unumwunden, daß er von einer völligen Beherrschung der Sprache, die er unterrichtet, noch weit entfernt sei, ja daß er gerade deshalb unterrichte, um sich weiterhin vervollkommen zu müssen, und daß es sich bei seinen Aufenthalten in Japan philologisch immer wieder blamiere. Was zu sagen sei und was auf gar keinen Fall in den Mund genommen werden dürfe, richte sich nicht nur nach der Sache, die ausgedrückt werden soll, sondern auch, und das in feinsten Schattierungen, nach der Person, die angesprochen werde, wie nach der Situation, in der sich die Gesprächspartner befinden.

Dieser Münchner Lehrer, von Haus aus Romanist und auf einem seitensamen Weg, nämlich über die intensive Beschäftigung mit Keramik zum Studium der fernöstlichen Sprache gekommen, ist schon froh, wenn seine Abiturienten nach zwei Jahren Japanisch einfache Aussage- und Fragesätze bilden können, Sätze ohne Untertöne, Assoziationen und Nebenbedeutungen. Doch sei auch schon viel gewonnen, wenn

der Schüler nur erfahren habe, daß die uns umgebende Realität auch anders zu begreifen sei als auf abendländische Weise. Der Schwierigkeitsgrad sei übrigens ein Reiz, weshalb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er, die mit dem ausgefallenen Wahlfach angefangen hätten, auch dabei blieben, obwohl sie sich das Schulleben gemittelter Gymnasien im Landkreis München spricht von „Schmallokal“, wemgleich von Bekömmleher, und teilt mit, daß seine Lehrkraft, ansonsten für Deutsch, Geschichte und Sozialkunde zuständig, noch nie in Japan war. Um solchen Mängeln abzuhelfen, ist jetzt von Staats wegen ein Studien- und Förderprogramm eingerichtet worden, das auch Reisen in den Fernen Osten umfaßt.

Engste persönliche Beziehungen können sich philologisch segensreich auswirken, denn wer ohnehin an den Lippen eines anderen Menschen hängt, hat wenig Mühe, sich dessen Worte einzuprägen. An einer anderen Münchner Schule unterrichtet eine Deutsche, die mit einem Japaner verheiratet ist und von einem ihrer Kollegen um ihr tägliches Sprachtraining beneidet wird. Doch garantiert die Ehe nicht alles. In mit einem Deutschen Kleinstadt lebt, mit einem Deutschen verheiratet, eine Chinesin aus Taiwan. Obwohl keine ausgebildete Pädagogin,

sie an der Schule, die ihre Tochter besucht, den Chinesischunterricht, der ebenso erwünscht ist wie die Unterweisung im Japanischen. Die Sache ging binnen kurzem schief, obwohl der Direktor sehr interessiert war und sich selbst bei dieser Gelegenheit auf die Schulbank gesetzt hatte.

Warum aber wird im unterfränkischen Marktbreit, Landkreis Kitzingen, Chinesisch unterrichtet? Weil dem dortigen Lehrkörper zufällig ein deutscher Enthusiast angehört, der mit seinem Wahlfach Erfolg hat. Dabei spielt nach Meinung seines Schulleiters eine Rolle, daß in Kitzingen ein Unternehmen besteht, das Brauereianlagen herstellt und enge Beziehungen zu China unterhält.

Ob Japanisch, ob Chinesisch - die Lehrer genießen größte pädagogische Freiheit und werden in fachlicher Hinsicht so gut wie überhaupt nicht kontrolliert. Wer auch sollte im Rahmen der Dienstaufsicht diese Aufgabe übernehmen? In der Regel genügt das Vertrauen des Schulleiters. Wichtig ist, daß bei jedem Lehrer das pädagogische Hobby auf die Pflichtstundenzahl angerechnet wird. Das hat Auswirkungen auf die Beschäftigung der Pädagogen im allgemeinen, denn es müssen um so mehr Lehrer eingestellt werden, je mehr der Wallunterricht ins Kraut schiebt.

F.A.Z. 22.12.87

## Die Sprache öffnet in Ostasien viele Türen

Universität Tübingen soll Schwerpunkt der Ostasienwissenschaften werden

Sch. FRANKFURT, 4. Oktober. Der pazifische Raum wird immer mehr zu einem wirtschaftlichen Schwerpunkt. China, Japan und Korea gehören heute zu den wichtigsten Partnerländern der Bundesrepublik. Die Landesregierung Baden-Württemberg will daher die Ostasienwissenschaften an den Hochschulen ihres Landes ausbauen. Die Heidelberger Universität bietet bereits Studiengänge in Japanologie und Sinologie an, in Freiburg kann man Sinologie studieren. Zu einem Schwerpunkt soll jedoch die Universität

auf die englische Sprache beschränken müßten. Gerade in Ostasien, sagte Englert, reiche die Beherrschung der Sprache allein auch nicht aus, um persönliche, wissenschaftliche, technische und politische Beziehungen aufzunehmen oder zu pflegen. Eine wichtige Voraussetzung dafür sei vielmehr ein breites Spektrum an landeskundlichen und kulturhistorischen Kenntnissen.

Nach Einrichtung der Magisterstudiengänge (Haupt- und Nebenfach) im Fach Koreanistik (Wintersemester 1981/82) können in Tübingen alle drei ostasiatischen Sprachen gelehrt werden. Die Zahl der Studierenden ist seit dieser Zeit stark gestiegen, und zwar im Fach Japanologie von 50 (Wintersemester 1982/83) auf 153, in der Sinologie im vergleichbaren Zeitraum von 111 auf 289 und in der Koreanistik von 5 auf 21. Nach Angaben von Englert soll das Lehrangebot dieser Studiengänge, die als Nebenfach auch mit dem Studiengang Wirtschaftswissenschaft/Regionalkunde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ät verbunden sind, aufgestockt werden.

Außerdem soll ein sogenanntes „Ostasienkolleg“ eingerichtet werden. Da die Sprachausbildung und die heutige Lage in China und Japan mit einem traditionellen neunsemestrigen Studiengang nicht mehr vermittelt werden könne, heißt es dazu in der Begründung, wolle man einen neuen Weg der Ausbildung beschreiben und zunächst ein Japan- und ein Chinakolleg gründen. In den Kollegs soll in einem internatsmäßigen Studienbetrieb sehr viel intensiver die Sprache gelernt werden. Er soll die Teilnehmer befähigen, sich auf einen Aufenthalt in Japan oder China sprachlich und landeskundlich ausreichend vorzubereiten. Bisher haben die Studierenden in den ersten vier Semestern, also bis zur Vorprüfung, nur etwa 400 Stunden Sprachunterricht absolviert - nach Ansicht der Universität viel zu wenig, um beispielsweise die Sprachprüfung zu

*Derzeit sind nahezu 1200 Japaner an Hochschulen der Bundesrepublik eingeschrieben, dagegen studieren nur 150 Deutsche an japanischen Universitäten. Das Studium der deutschen Sprache wird in Japan sehr gefördert: Mehr als eine Million Japaner lernen intensiv Deutsch, es gibt 2800 Hochschullehrer für Deutsch, darunter 160 deutsche Dozenten. Nach den Berechnungen des Deutschen Akademischen Austauschdienstes stehen etwa 30 000 Japanern, die Deutsch einigermaßen fließend sprechen, nur etwa 500 Deutsche mit vergleichbaren Kenntnissen der japanischen Sprache gegenüber.*

Tübingen ausgebaut werden. Baden-Württembergs Wissenschaftsminister Professor Dr. Helmut Englert begründet diese Entscheidung damit, daß in der Wissenschaft, bei staatlichen Institutionen und in der Wirtschaft ein wachsender Bedarf an Personen bestehe, denen die Verhältnisse in Ostasien dank eigener wissenschaftlicher Beschäftigung vertraut seien. Heute zeige sich zunehmend, daß kulturelle und wirtschaftliche Beziehungen nicht ausreichend gepflegt werden könnten, wenn sich die Beteiligten auf beiden Seiten vor allem

bestehen, die zur Aufnahme des Studiums in Japan berechtigt. Nach Angaben des japanischen Kulturministeriums sind für das Bestehen seiner Prüfung mindestens 900 Unterrichtsstunden nötig.

Die neuen Kollegs sollen aber nicht nur Studierende der herkömmlichen Studiengänge in beschränkter Zahl aufnehmen, vielmehr auch solche Fachkräfte, die später in ihrem Beruf als Kaufmann, Ingenieur oder Arzt in Japan oder China arbeiten wollen.

Als dritte Maßnahme wird die Universität Tübingen zum ersten Mal ein sechswöchiges Trainingsprogramm „Wirtschaftspartner China“ im Heinrich-Fabri-Institut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Forschungszentrum) in Blaubeuren anbieten. Zur Teilnahme an diesem Seminar will

man Führungskräfte aus der Wirtschaft einladen, die Interesse am Aufbau und an der Pflege erfolgreicher Beziehungen zu Wirtschaftspartnern in China haben. Zum Trainingsprogramm gehören ein Sprachintensivkurs „Elementares Chinesisch“ und die Einführung in die Landeskunde sowie in das Wirtschafts-, Finanz- und Verwaltungssystem der Volksrepublik. Die Absolventen sollen auch befähigt werden, sich in China ohne Dolmetscher zu bewegen und sich im chinesischen Alltag und mit den chinesischen Umgangsformen zurechtzufinden. Zu diesem Trainingsprogramm werden maximal 20 Teilnehmer zugelassen. Anmeldeschluß ist der 20. November. (Wissenschaftliche Fort- und Weiterbildung, Universität Tübingen, Wilhelmstraße 4, 74 Tübingen.)

## Ostasien-Institut in Düsseldorf

Fast unter absoluter Geheimhaltung in der Vorbereitungsphase wurde mit einem Paukenschlag am 1. Juli im Düsseldorfer Schloß Benrath die Gründung des Ostasien-Instituts der 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bekannt gegeben.

Die Festredner — NRW-Ministerpräsident Rau, der Vorstandsvorsitzende der Westdeutschen Landesbank, Friedel Neuber, und Uni-Rektor Prof. Gert Kaiser — erläuterten vor einem ausgewählten Kreis nordrhein-westfälischer Wirtschaftsvertreter die fast „revolutionären“ Pläne für die Gründung des neuen Instituts.

Schwerpunktmäßig wird sich das Ostasieninstitut (OAI) der Uni Düsseldorf der VR China, und hier insbesondere der Wirtschaft widmen. „Revolutionär“ daran ist, daß das zweijährige Aufbaustudium ausschließlich praxisorientiert sein wird. Das

wird z.B. bis zum Training für Verhandlungen zwischen Deutschen und Chinesen gehen. Zielgruppen sind Mitarbeiter von Firmen und Verwaltungen, die konkret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mit der VR China haben, aber auch Studenten aus dem Bundesgebiet, die als Berufsperspektive einen Job in Wirtschaft oder Verwaltung china-orientierter Unternehmen suchen.

Träger und Sponsor des OAI wird ein Förderverein sein, der sich im wesentlichen aus Vertretern der Industrie unter Federführung der Westdeutschen Landesbank zusammensetzt.

Auslandspraktika, Gast-Professuren für Vertreter der Partnerländer und Ausbildung von deutsch-ostasiatischen Managern (speziell China) sind wesentliche Bestandteile der Planung. Die Aufnahme des Vorlesungsbetriebes ist für das Sommersemester 1988 geplant.

dnC Nr. 3/1987

## Dolmetscher-Institut lehrt jetzt auch Chinesisch

Die Einführung des Faches Chinesisch als Haupt- und Zusatzsprache an der staatlich anerkannten Fachakademie für Fremdsprachenberufe des Sprachen- und Dolmetscher-Instituts München (SDI) hat Kultusminister Hans Zehetmair jetzt genehmigt. Damit besitzt Bayern die bislang einzige Ausbildungsstätte für Übersetzer und Dolmetscher für chinesisches als Hauptsprach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r bayerische Kultusminister sieht in dieser Tatsache auch einen Ausdruck der besonders engen Beziehungen Bayerns zur Volksrepublik China.

Für das laufende Schuljahr haben sich bereits 23 Bewerber für die Ausbildung in chinesisches eingeschrieben, darunter waren sogar deutschsprachige Interessenten aus Taiwan. Da das erste Jahr der Fachakademieausbildung auf Grundkenntnissen des Chinesischen aufbaut, konnten Bewerber ohne Vorkenntnisse nicht berücksichtigt werden. Dennoch ist das Interesse überraschend groß. Für das kommende Schuljahr liegen bereits zahlreiche Vormerkungen von Interessenten vor, die über gute Chinesischkenntnisse verfügen. Damit kann voraussichtlich jedes Jahr neu mit einem Ausbildungsgang in chinesisches begonnen werden — geplant war zunächst nur ein zweijähriger Turnus.

Als Lehrkraft für das neue Fach ist an der Fachakademie unter anderen Professor Zhang Renli von der Fremdsprachenuniversität Peking tätig. Professor Zhang kann auch selbst praktische Dolmetschererfahrung vorweisen: Er dolmetschte unter anderen auch für den bayer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bei dessen letzter Chinareise.

SZ. 12.2.88

## China-Kurse für Führungskräfte

bhr. TÜBINGEN, 20. September. Dem zunehmenden Interesse an den Ostasien-Wissenschaften (Sinologie, Japanologie, Koreanistik) will der baden-württembergische Minist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Engler, Rechnung tragen. An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wo im letzten Wintersemester 289 Studenten Sinologie, 153 Japanologie und 21 Koreanistik studierten, sollen die Ostasien-Wissenschaften ausgebaut werden. Die Zahl der Stellen des wissenschaftlichen Personals für diese Fächer wird von 10 auf 15 erhöht. Da der traditionelle neunsemestrige Studiengang nicht mehr ausreicht, genügend sprachliche und sonstige Kenntnisse von China und Japan zu vermitteln, will die Universität Tübingen neue Wege gehen und ein Japan- sowie ein China-Kolleg einrichten. Dort soll Sprachschulung „internatsmäßig“ betrieben werden. Engler berichtete, bisher hätten die Studenten in den ersten vier Semestern, also bis zur Vorprüfung, nur etwa 400 Stunden Sprachunterricht absolviert. Das sei viel zu wenig, um die Sprachprüfung zu bestehen, die zur Aufnahme des Studiums in Japan berechtige. Aus dem japanischen Kultusministerium sei zu hören, daß zum Bestehen der Prüfung mindestens 900 Unterrichtsstunden nötig seien. 1988 wird die Universität Tübingen in Blaubeuren ein sechswöchiges Trainingsprogramm „Wirtschaftspartner China“ anbieten.

FAZ. 21.9.87

## Japanologie in Heidelberg

Ihre Meldung mit der Überschrift „Der Studiengang Japanologie“ auf der Seite „Was werden?“ (17. August) ist nicht ganz zutreffend. Die dpa-Meldung besagt, das baden-württembergische Wissenschaftsministerium plane, „in Heidelberg das Fach Japanologie, in Freiburg dagegen die Sinologie und in Tübingen beide Fächer auszubauen“. Was Heidelberg betrifft, ist folgender Sachverhalt richtig: An der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wurde die Japanologie neu eingrichtet, die Sinologie darüber hinaus aber um einen weiteren Lehrstuhl verstärkt. Die Universität beabsichtigt, zusammen mit den genannten Fächern und der ostasiatischen Kunstgeschichte sowie anderen nach Fernostasien orientierten Fächern ein Asienzentrum zu gründen, dem später eventuell auch noch die Koreanistik zugeordnet werden könnte.

Dr. Michael Schwarz, Pressesprecher,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FAZ. 21.9.87

## 《汉语学习》(双月刊)简介

《汉语学习》不断介绍国内现代汉语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新成果, 提出现阶段现代汉语的新课题, 交流国内外有关现代汉语的新信息, 是一份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学术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的现代汉语专业刊物。

《汉语学习》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汉语工作者和大、专、中学的汉语(语文)教师, 特别是国内外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师以及其他汉语爱好者为读者对象。

《汉语学习》自1981年公开问世以来, 不断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热情关怀、鼓励和支持、爱护, 目前刊物已经发行到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 国外15个国家和地区。最近, 对过去几年的工作做了一次全面总结, 从整顿编辑机构, 调整编辑人员, 决心在继续发扬成绩, 克服缺点的基础上, 竭尽全力把刊物办得更好。

《汉语学习》1987年在国内外扩大征订: 国内由全国各地邮局发行, 每期定价0.40元, 半年订费1.20元, 全年2.40元, 国内刊号为12—36。国外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国际书店)发行, 国外刊号为BM685。如果在当地错过了订阅期限, 也可以向本刊编辑部直接办理订阅手续。

《汉语学习》特别欢迎国内外读者和作者随时投稿, 并且随时加强联系, 介绍国内外各地研究和教学现代汉语的情况, 报道现代汉语教学工作的经验。同时希望各地作者和读者对本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广泛提出意见。

来信请寄“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汉语学习》编辑部”。

## 《汉语学习》编辑机构

顾问: 吕叔湘 张志公  
编委: 朴春范 刘明章 吴昌 金泰坤 崔吉元  
主任委员: 刘明章  
主编: 吴昌  
编辑: 柳英绿 吴硕官